

江西

师范大学历史学文库
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丛书

谢宏维 ◎著

和而不同

——清代及民国时期
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



经济日报出版社

江西

师范大学历史学文库
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丛书

谢宏维 ◎著

和而不同

——清代及民国时期
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



江西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谢宏维著.

-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80257 - 021 - 4

I. 和…

II. 谢…

III. ①社会关系 - 研究 - 万载县 - 清代

②社会关系 - 研究 - 万载县 - 民国

IV. 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5350 号

书 名：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

作 者：谢宏维

组稿编辑：王 含

责任编辑：陈昌文 朱秀英

出版发行：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邮编：100054）

电 话：010 - 63568136（编辑部） 010 - 88282292（邮购部）

网 址：www. edpbook. com. cn

E - mail：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9.875

字 数：275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57 - 021 - 4

定 价：28.00 元

特别提示：版权所有·盗印必究·印装有误·负责调换

《江西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总序

方志远

呈献给读者的是万振凡、陈晓鸣、游海华、谢宏维、李平亮五位青年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这五部著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特定的“地域”为个案或中心，对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江西社会特别是江西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些年来，受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学术思潮的双重影响，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极为深刻乃至带有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学术理念、学术视野、研究方法、关注热点、思维方式及表述方式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来。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中国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已经进入多种学说并存、各种方法并用的时代，地方社会研究、区域经济研究及近代社会转型问题研究更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学术潮流。五位作者多年在外地求学，感受风气之先，投身于这一学术潮流之中，可以说是真正“预流”了。^①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这几部著作的选题显然都经过深思熟虑。九江在明代已经是全国七大钞关之一，也是江西唯一的长江口岸、唯一的近代开埠港口，风雨沧桑中记录着江西由传统走向近代艰辛而蹒跚的脚步。万载流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清初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乃至与台湾民众的暴动遥相呼应，这故事背后又有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采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哪些故事？苏区研究是热点，但对后苏区时代这片土地上经济社会重建和复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这种反差可以理解，但这块禁区确实应该被打破。南昌是江西的省会，自然也是士绅“精英”集聚之地，他们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做了些什么，为何没能像上海、苏州、杭州、广州乃至长沙、昆明的士绅那样，尽快把江西推向近代化？江西是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省份，今天的“三农”问题仍然十分严峻，这种“传统”是如何向“近代”转型的、转型到了何种程度？其间的痛苦和曲折也该认真进行理性探讨。

不少学者在研究自己的“个案”时，总要声称这个个案如何与众不同、又如何具有典型意义。平心而论，我认为上面这些课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也不具备“唯一性”。恰恰相反，它们却具有多发性。万振凡博士所讨论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前后”的江西乡村社会结构变化、游海华博士所讨论的红军撤离后前中央苏区经济社会重建与恢复，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苏区、白区也同样存在。陈晓鸣博士所讨论的关于近代九江“中心”与“边缘”角色转换，至少在长江沿岸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谢宏维博士讨论的流民与土著问题、李平亮博士讨论的士绅在地方社会的作用问题，不用说全国，即使在江西范围内，也不是个别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上述课题的意义和价值。其实，越是没有特殊性，越是不具备唯一性，课题的研究或许才越具有普遍意义，才越可能为其他的研究提供参照系。从绝对意义上说，“随机抽样”的代表性比“选择试点”要大得多。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属性，但这种创新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新资料的被发现或老资料的新解读，再比如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新发现、新突破。当然，也希望有新的理论或方法被引进或被运用。一个好的学术研究，当然希望有多处创新乃至突破性的发现，但所有历史研究的创新，又都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上，那就是用材料说话。史学研究可以有多个假设，也可以有多种方法或手段，但必须要有材料为基础，否则，假设永远是假设，方法和手

段也成“空手道”。

我并不企望这套书在所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只是希望每项研究与已有的相关成果相比，材料更加丰富一些，最好有新材料被挖掘，并在资料的考辨上多下功夫；只是希望它们的视野更开阔一些，对历史的理解更深一些，对现实的关怀更多一些，能够提出将研究推向深入的问题。或许是个人的偏见，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在同一个模式或板块中符号或名称的变更，如“江南”换成“江西”、“四川盆地”换成“吉泰盆地”、“太湖流域”换成“鄱阳湖流域”，乃至“赣东北”换成“赣西北”，等等。我同样不希望这些研究是单个的、孤立的、无视国家权力存在的所谓地方社会研究，在中国大地上恐怕还找不到不受政府影响的“世外桃源”。如果其中有作者宣称：在赣江流域也发现了施坚雅的“六边形”、在江西地区也看到了黄宗智的“内卷化”和杜赞奇的“文化权力网络”；如果其中有作者宣称：我研究的这块地方就是这块地方自身的发展过程，就是纯粹的“这一个”，至于其他因素，非我所知。如果是这样，改一句流行歌词：“如果是这样，我真的很悲哀。”所幸的是，结果不是这样，作者们所进行的，都是具有一定创见性的资料详实的实证研究，作者们都是在充分关注国家权力与底层社会的关系中、在历史发展的动态进程中讨论自己的“个案”。

游海华《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涉及到的是一个早就应该讨论却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的问题，一个被重重迷雾笼罩的问题，即后苏区时代赣闽边区的重建问题。1929~1934年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犹酣”，处于“围剿”与“反围剿”中心区的中央苏区，即赣闽边区，其人口、经济与社会遭受巨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革命之后——不管是暂时的失败还是永久的胜利——老百姓还要居家过日子。1934年底，国共大规模争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建赣闽边区地方政权的基础上，在社团组织恢复、难民救济、民众思想整合、社会关系调整、社会经济复苏及产权处置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确定

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至 1937 年春，边区社会重建与整合基本完成。尽管此过程中少不了并仍然伴随着阶级利益的争斗，但它促使社会经济呈恢复性成长，加快了边区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也为日后东南抗战夯实了基础，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该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注重传统史学和社会史方法的运用，并采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民法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现代化转型和社会发展观层面考察了 1934 ~ 1937 年间赣闽边区的社会重建与整合。可以相信，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总结良性社会发展所应具备的基本社会规律（则），对于促进当前公民理性认识和有序推进新世纪的中国社会改革，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成功构建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性意义。

晚清时期，由于地方军事化的需要及市场网络的重组，不少“新社会阶层”通过军功、捐纳等“异途”进入到士绅的行列，导致南昌士绅构成的多元化。清末科举制的废除、民初议会政治的出现，又使不少“耕读”士绅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和社会地位，南昌的士绅阶层一度趋于分化与解体。但是，士绅们在外部世界的启示下，通过成立各种社团、创办新式学校和组建议会，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对地方政局实现了全面控制。特别重要的是，在士绅阶层创办新学、推进地方自治、参与议会政治等“现代化”活动中，南昌的社会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并发生了转化，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有机结合。这是李平亮《卷入大变局——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的士绅与地方政治》给我们讲述的一段清末民初南昌地方社会的转型故事。作者将人们常说的“内因”与“外因”置于同一历史脉络之中，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内在机制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也试图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两个层面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中揭示南昌的近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士绅阶层既没有被“边缘化”，也没有急于依附“现代国家”而脱离地方社会，他们既积极参与各种现代政治事务，又仍然

热衷于传统社会活动，从而在自身的重塑中实现了对地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宗族组织、神庙系统、慈善机构等地方文化也十分自然地融入现代国家之中。

与李平亮研究江西的中心城市不同，谢宏维将目光投向了赣西山区的万载县。在《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中，谢宏维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曾经令中央政府关注的蕞尔小县是如何在争斗不息中构建起相对安定的地方社会的。明末清初移民的大量进入，影响了万载县此后几百年间地方社会的变迁。在此期间，移民与土著、移民与国家、土著与国家、移民内部、土著内部、国家官员内部，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微妙纷呈、错综复杂，时时引发剧烈的矛盾与冲突。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从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出发，把土、客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事件纳入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和权力关系中，以揭示在国家的影响下土客关系演变的机制与逻辑。作者致力于收集和利用地方文献，强调文献解读与实地调查的结合，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追寻和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地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细致地重构江西万载县 300 多年间跌宕起伏的土客冲突——国家应对的历史过程，作品向我们揭示了万载县土著和移民通过几百年的矛盾斗争悟出的一个道理：要和平共处、要安定和谐，就必须遵循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必须遵循最基本的办事规矩。而这些本来最普通不过的规矩，在特定的情况下竟然需要通过反复的冲突并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被接受。

九江特殊的位势，使其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带有明显的双重性。明清时期，九江在江西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但在长江流域却发挥着货物调剂中心的功能。近代开放以后，九江的角色随着全国市场和流通格局的变化发生了转换：在江南腹地的江西，九江从传统社会经济的边缘转为近代进出口贸易的中心；但在长江流域，九

江却由传统社会的货物调剂中心转为近代贸易体系的边缘。这种角色换位决定了九江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方向。陈晓鸣《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1858～1938）》，选择从中心到边缘双重角色换位的角度对九江进行专题研究。全书综合运用历史学、城市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有关理论和方法，将九江与其所处的江西腹地和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深入探讨了九江社会的传统功能与近代角色的转换，论证了九江以内外贸易为纽带、与江西内腹地区以及长江贸易中心城市之间互补互动的双向关系，剖析了九江从中心到边缘的变换历程，并以九江城市为基点，从经济转型、城市发展、城市社会变迁等方面对九江近代社会的转型进行梳理，揭示了九江近代转型不完整性这一基本特征，进而探讨了九江在中国城市近代转型中所具有的类型学意义。

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江西农村革命与改良冲击为例》仔细分析了革命前后江西乡村社会结构，认为“弹性结构”是土地革命前江西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要害。作者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要素的再生功能、结构系统的弹性空间和整体结构的弹性三个层面，对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进行剖析，并根据弹性力学原理，构建了“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在外力作用下的运行模型。作者提出，传统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革命与改良这两种社会变迁基本动力的冲击与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互动的过程。既然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弹性结构”，那么在革命、改良的冲击下，其变迁就有可能遵循类似于弹性物体的形变与反弹、变与不变等运行逻辑展开。作者描述了在革命和改良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轨迹：在乡村革命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结构经历了一个由表层结构形变、深层结构内核保留到整体结构反弹的过程；在乡村改良措施的作用下，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具有明显的“重建”容易、“复兴”却难的弹性特点。作者认为：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社会改造的对象存在着一个不易改变的“弹性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张巨型的弹性之网，

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减革命与改良的绩效。因此，传统乡村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弹性结构的解构。

很高兴地看到，这几部书的作者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十分注重史料的收集和考辨，比较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也对海外中国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给予了高度重视，试图运用其中的某些方法来解读文献、解释现象，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坦率地说，也留下了一些模仿的痕迹，说明这些理论和方法还没有完全融入自己的研究理念和体系之中。这十分正常，也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学习和实践需要一个过程。相对于其他作品，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 1927 ~ 1937 年江西农村革命与改良冲击为例》显得更“另类”一些。该书逐个分析了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用以解读中国社会的种种“模式”，指出其贡献与不足，同时引入弹性力学的“弹性结构”概念，试图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改良冲击下的江西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为例证，为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史提供一个本土化的分析模型。我赞赏作者的勇气，但也心存疑虑，不知这个“本土化”的模型是否经得起检测，它与 20 年前的“超稳定结构”有何不同？而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如果心中总是有着一个模式、装着一块样品，如果总是想追求对某种方法的运用、某种理论的实践，学术研究是无法达到“化境”的。这就需要加快“学习”和“消化”的过程。

其实，任何“科学”的方法都是相对的，任何研究模式都是有缺陷的。没有哪一种“科学方法”可以包治百病，也没有哪一个模式能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历史研究尤其如此。历史学应该同时具有描述和研究人类社会进程的两种功能，应该是多种学派并存、各种方法并用。人类社会发展的精彩纷呈要求历史学的丰富多彩。历史学在本质上是研究人、研究人的思维和人的活动的学科，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别，不仅仅在于可能复原与

不可能复原、可能重复与不可能重复的差别^①，更在于获取结论的方式和途径的差别，是内心的感悟和仪器的测试之间的差别。自然科学更依赖仪器测试，人文科学更讲究内心感悟。

历史研究当然也需要像自然科学的研究那样，尽可能地用准确的数据说明问题。但当暂时缺乏数据乃至无法获取数据时，也没有必要强求。严格地说，在历史研究中，数据是用来辅助文献记载、用来印证史家感悟，而不是用来决定研究结果。数字可以在具体的细节上修正感悟，但感悟却是整体真实的反映。如果历史学家通过考辨和分析史料得出的本来正确的感悟被貌似准确其实片面的数字修正得不正确了，才是真正的悲剧。当然，也有一些不很正确的感觉会被准确的数字修正或推翻，但这种感觉也一定有它产生的道理，或者说一定有数据所无法表现的历史真实。历史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反映整体的真实，而未必斤斤计较于个别的真实。相反，无数个真实细节的拼凑，倒是可能破坏整体上的真实。

试举一例。《汉书·食货志》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表达的是整体上极端的贫富不均。如果通过所获得数据宣布：以某某富者为例，确实占有大片土地，有田地若干顷，但也

① 复原历史的努力已经产生出一批又一批具有价值的成果，但历史其实是不可能被复原的。西方学者深入到现存的一些原始部族中生活，试图以此来寻找远古时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也早已陷于困境。因为他们可以说明现存的这一部族的现实情况，但不可能复原这一部族过去的情况，更无法断言这一部族的现实情况即是那些早已不再存在的部族过去情况。一些西方人类学家和中国学者深入乡村或山村进行考察，这对于搜寻当地居民乃至他们的先民的活动信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现在学者们所展示的“田野发现”显然都是经过“污染”的，即都是受现代生活影响的。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村委会，有了电灯电话电视机，在这种状态下，今天的傩戏除了脸谱等可以“形似”之外，还有多少“原始”形态？今天的“客家”除了已经少有人住的“围屋”之外，还有多少过去客家的习惯？当然，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否定田野调查，恰恰相反，通过自己有限的田野调查，特别是同行学者大量的田野调查信息，已经给了我许多重要的启示。我的意思仅仅是，田野调查可以获得许多文献和实物资料，也可以获取诸多历史信息，但更多更实在的“感受”和“接近”，却是今天的现状。这也是许多朋友逐渐将目光由古代、由明清投入近代乃至当代的重要原因。

未必“田连仟伯”；同样通过统计宣称：以某某贫者为例，多少有一点土地，或者有一处陋室栖身，并未真的无“立锥之地”。这种研究成果固然达到了具体的、个案的真实，但在整体的真实性上则大打折扣、倒人胃口。

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决定了东方人和西方人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应该保留中国历史学和西方历史学差异的存在。借用谢宏维的书名，东西方之间在学术上应该“和”，应该相互借鉴、相互对话，应该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但也不必事事都趋“同”。为什么就不可以保留“不同”？为什么必须弄得千人一面，把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完全抛弃？再改用那句歌词：“如果是这样，我真的很悲哀。”如果这样，这个“轨”宁可不接也罢。事实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千篇一律，杜赞奇可以建构“文化权力网络”，孔飞力却可以高声“叫魂”；何炳棣可以对明以来的人口统计进行质疑，黄仁宇则可以娓娓叙说万历十五年。

我一直认为，如果有宽松的研究环境、良好的研究条件、平和的研究心态，中国史研究的最好成果应该是由中国学者贡献。因为只有体内流淌着中国血液，才有可能真正用心去感受中国的事情、才可能有与生俱来的对中国问题的感悟。历史学家应该有“纵览天下”的视野，却不必也不可能承担起“包打天下”的责任。除去浮躁、卸下不该揽起的包袱，好的作品或者更容易出来。

江西师范大学“传统社会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确立了江西民间文献与实物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明清江西移民与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开发、江西近代社会转型三个重点研究方向，“江西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丛书的出版，正是其中部分成果的展示。

目 录

总 序

第一章 导 言

- 一、走向历史现场的中国移民史研究…………… (1)
- 二、作为区域与个案的江西万载县…………… (10)
- 三、基本思路与分析架构…………… (14)

第二章 移民迁入与地方变乱

- 第一节 移民进入及其经济活动…………… (18)
 - 一、移民的迁入…………… (18)
 - 二、移民的经济活动…………… (22)
- 第二节 “棚乱”及其影响…………… (30)
 - 一、“棚乱”…………… (31)
 - 二、驱“棚”运动…………… (36)
 - 三、“后遗症”…………… (42)

第三章 国家认同与移民入籍

- 第一节 “棚民”政策的出台与执行…………… (46)
 - 一、温上贵事件…………… (46)
 - 二、中央政策的出台…………… (50)
 - 三、地方政府的“土政策”…………… (60)
- 第二节 里甲组织与土著的抵制…………… (67)



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

一、清初里甲组织的重建	(67)
二、清前中期赋役承担方式的变化	(79)
三、万载的户籍区分及其涵义	(86)
 第三节 移民的入籍	(97)
一、顶递入籍	(97)
二、附图入籍	(101)
三、外县入籍与“冒籍”	(105)
 第四章 土客冲突与族群认同	
第一节 学额纷争案	(112)
一、客籍不得城居案	(112)
二、嘉庆八年之前的学额纷争	(116)
三、嘉庆八年之后的学额纷争	(122)
四、学额案所反映的关系	(129)
第二节 书院的兴盛	(139)
一、清中期万载经济的发展	(144)
二、清中期万载书院的发展	(145)
第三节 《土著志》与土著集团的形成	(161)
一、道光十二年《万载县志》	(161)
二、辛氏长、幼两房互控案	(166)
三、《万载县土著志》	(174)
第四节 “东洲籍”与客籍集团的形成	(189)
一、东洲书院的发展	(190)
二、“东洲籍”的形成	(194)
 第五章 国家干预与土客融合	
第一节 清中后期至民初土客关系的松动	(201)

一、太平天国运动与万载土客绅士的反应·····	(201)
二、清末民初的土客关系·····	(209)
第二节 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客关系·····	(212)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地方社会·····	(212)
二、阶级斗争与土客籍的反应·····	(214)
第三节 国民政府的政权建设与新族学·····	(224)
一、政权扩张下的万载地方社会·····	(224)
二、新族学的发展·····	(225)
三、地方社会的评价·····	(230)
第四节 东洲学产案·····	(232)
一、客籍的教育机构与权力机关：从东洲中学到东洲公局 ·····	(232)
二、东洲学产案·····	(243)
三、万载绅士的评说·····	(264)
四、难圆之梦·····	(269)
 第六章 结 论	
一、和而不同：土客关系的演变轨迹及其内在机制 ·····	(274)
二、化干戈为玉帛：国家官员与地方绅士的权力技术 ·····	(277)
 参考文献·····	(283)
 后 记·····	(298)

第一章 导 言

本书试图通过细致地展现江西万载县 300 多年间跌宕起伏的土客冲突与国家应对的历史过程，把土、客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事件纳入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和权力关系中，以揭示在国家的影响下土客关系演变的机制与逻辑。

一、走向历史现场的中国移民史研究

1932 年，谭其骧先生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后改为《湖南人由来考》）^①，此文为研究湖南移民问题的最早力作。以后因种种原因，谭先生未能按其设想写成一部中国移民史的专著，这一学术传统与追求为其弟子们所继承。1997 年，由葛剑雄教授主编，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等教授合作撰写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问世（此前出版了《简明中国移民史》）。这部著作是目前国内最完整、最系统的中国移民通史，约 260 万字，论述了自先秦时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对其中主要的移民运动，一般都说明其起因、迁移对象、迁移时间、迁入地、迁出地、迁移路线及方向、定居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并尽可能作定量分析，总结其规律。^② 在第五、

① 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学年报》第 1 卷第 4 期（1932 年）；《湖南人由来考》，《方志月刊》第 6 卷第 9 期（1933 年）；谭其骧：《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见《中国移民史》各卷封底所作的介绍。

六卷关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移民研究中，作者曹树基教授的基本思路是“确定移民的分布范围——确定各地移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确定各地标准时点的人口数——求出移民的人口数”，着眼点是“求证本期各次移民的数量和规模”，围绕着战乱——人口损失——移民浪潮这一基本线索展开。^① 通过《中国移民史》及《中国人口史》^② 等著作，葛剑雄教授等人确立了人口史、人口历史学框架下的移民史研究的一般模式^③。当然，除此之外，也具体、深入地讨论了其他一些极有意义的论题，如移民与土著的关系、“客家”移民社会的形成等问题。

就在同一年，香港科技大学年轻的学者郑锐达完成了《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一文^④，首次以一个区域和一个家族为个案，考察了赣西袁州府（以萍乡县为重点）的移民如何入籍、参加科考并逐渐产生地方精英的过程。其研究不仅将里甲制度引入移民入籍问题的讨论，同时也将移民能否入籍及其户籍类别纳入移民地区各个社群权力关系的视野。此文是赣西地区移民史最详实而富有说服力的案例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显示了与上述中国移民史研究不同的学术旨趣和风格：葛剑雄、曹树基教授等人的研究具有宽广的视野，以及对一般理论模式和规律的追求与努力；而郑锐达的研究则提醒我们，与此同时还有转换研究视角的空间与必要，进行更多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将移民的历史置于地方社会的具体情境中，探讨其内部关系及运作机制。

在很大程度上，郑锐达的移民史研究受益于自 20 世纪 80 年代

①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卷后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48 页。

② 全书 300 余万字，分为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9 月出版。

③ 也有论者指出：“作者未能建立一套制约移民产生及其流向的一般模式……本书未能提供一个自足的解释系统，其成果只限于用移民运动说明其他历史现象，而不能深入揭示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参见关文：《追寻中国历史的潜流——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评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④ 郑锐达：《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香港科技大学未刊硕士论文，1997 年。